

# 1918年山西鼠疫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之比较

段珺珂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忻州 034000)

摘要：1910年东北爆发肺鼠疫。1918年，山西发生大规模鼠疫。两次鼠疫传染源均为疫源地携带病毒的动物，为肺鼠疫。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东北鼠疫死亡人数明显更高。两次鼠疫中都设置了专门的防疫机构，制定了相应法律法规，邀请了专业人士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其中伍连德的经验与研究成果要更高一筹。两次鼠疫都进行了清查鼠疫感染者和疑似病人的行动，采取了隔离、清洁消毒等措施，都很重视对防疫知识、措施、法规的宣传。从影响来看，两次疫情的控制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医的发展，疫情结束后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

关键词：东北鼠疫；山西鼠疫；比较

Comparison of pestis in Shanxi Province in 1918 and pestis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10-1911

DUAN Jun-ke

(Xinzhou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Province,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 In 1910, pulmonary pestis broke out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18, a large-scale pestis also occurred in Shanxi.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of the two pestis cases is the animal carrying the virus in the focus, which is pulmonary pestis. Due to natur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death toll of pestis in Northeast Chin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both pestis cases, special epidemic prevention organizations were set up,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formulated, and professionals were invited to guid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Wu Liande's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results were higher. In both pestis cases, we checked the pestis infected persons and suspected patients, took isolation,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measures,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i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knowledge, measure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 the control of both outbreaks was the resul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to some exten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After the end of the epidemic, a more detailed summary was conducted.

Key words: Pestis in Northeast China; Pestis in Shanxi; compare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依然饱受疫病的困扰。在一次次防疫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在逐渐建立完善。1910-1911年中国东北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规模鼠疫，作为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爆发的鼠疫，以及中国防疫近代化的标志，东三省鼠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18年，山西爆发了较大规模的鼠疫，并在政府的领导下迅速采取严格的措施，很快将鼠疫扑灭。从此次鼠疫的治理过程，能看到自东北鼠疫后，中国防疫体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 一、两次鼠疫始末

两次鼠疫传染源都是接触了疫源地的携带病毒的动物。东北鼠疫的传染源为啮齿类动物蒙古旱獭。20世纪初的旱獭皮毛贸易的巨大利润驱使中国东北的大量劳工进入俄国远东地区捕猎旱獭。旱獭身上往往携带有鼠疫杆菌，有猎户捕猎患病的旱獭，有些没有经验的还会带回患病的旱獭吃掉，使鼠疫向人群扩散。1910年9月，远东地区已经发现了多起鼠疫感染事件。为防止疫情扩大，俄国驱逐了疑似感染的中国劳工，从而将鼠疫传回了东北。1918年山西鼠疫实际上是由绥远鼠疫传入。但当时由于绥远已经单独治理，山西则由阎锡山事实上统治，在行政权力执行、防疫措施等方面都有所差异，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山西鼠疫。绥远鼠疫是由于开垦面积扩大，当地人接触了过去甚少接触的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鼠类，从而导致了鼠疫的爆发。

两次鼠疫类型都为肺鼠疫，传染速度快，发病快，死亡率高，因此两次鼠疫的传播速度都很快。在传播过程中，铁路都起到了加速疫情蔓延的作用。东北鼠疫，中国境内先于满洲里发现患者，人们在恐慌中沿着铁路公路四处逃奔，蔓延到东北全境及其他省份。正值春节，返乡的人群加剧了疫情的扩散。山西鼠疫最先爆发于1917年8月，在绥远扒子补隆的一个教堂发现病例，由于初期政府不重视，民众恐慌逃离，致使鼠疫扩散，很快传到包头、归化、丰镇等地，并开始向山西、山东、安徽、南京等省市蔓延，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当时内蒙和山西之间贸易往来较多，疫情经贸易商人传入山西大同右玉、左云等地，据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记录，“七年一月五号疫之由归绥侵入晋边右玉、左云等县”<sup>1</sup>。

从疫情后果来看，东北鼠疫死亡人数明显更高。东北疫情直到1911年4月才结束，造成了52462人死亡。绥远鼠疫到1918年5月被扑灭，共死亡14600人，其中资料显示山西死亡人数为2664人。之所以死亡人数相差较大，东北的恶劣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正值冬天，气温零下三十度，再加上很多民众生活本身就困难，恶劣的环境使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口密度，绥远疫情爆发地并非大城市，人流量相对较小，因此感染人数要少很多。传到山西境内后，与东北平原相对，山西北部多山，本身就较为封闭，传播范围自然有限。

## 二、两次鼠疫防治事务之比较

在鼠疫的治理方面，两次鼠疫政府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防疫力度也较大，疫情在较快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

从防疫机构的设立看，都设置了专门的防疫机构。东北鼠疫中，清政府发起成立“中央卫生会”、京师防疫局，统筹全国性防疫、部署防控事宜，东北三省则成立省级防疫治疫机构，之下各府县再成立防疫组织。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出台百余项防疫法规，对疫情的控制起到了作用。山西鼠疫，省一级建立了防疫机构有督军公署防疫办公处、省防疫总局，由阎锡山统筹领导。下面地区则分为疫区，邻疫区和无疫特别注重地，分别设置防疫分局，由县知事管理。由于晋北地区为染疫重地，还成立了晋北防疫事务所。两次鼠疫中，行政性防疫机构的设置都为疫情的管理提供了行政支持。但东北鼠疫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尚在萌芽，机构并不健全，之后才逐步完善。山西鼠疫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部分工作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但山西各级机构设置相当多，功能划分相当繁杂，事实上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两次鼠疫都邀请了专业人士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东北鼠疫中，外务部右丞施肇基邀请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的伍连德去东北指导防疫工作。伍连德到哈尔滨后实行了一系列科学的防疫措施。他提出了政

府的注意点应该在流动的人群和居民之中,发现鼠疫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居民死亡提出将尸体集中火化。在百姓的阻力下清政府采纳了伍连德的建议,在疫区推行火化尸体及焚毁感染者居所的政策。对尸体的处理,山西也有具体的规定,但并未强制火化,这一点上双方是有差异的。山西鼠疫,内务部介绍美籍医生杨怀德莅晋,被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sup>2</sup>与伍连德相比,杨怀德在整个疫病研究和贡献方面显然稍逊一筹。

在鼠疫的治理方面,两次鼠疫都进行了清查鼠疫感染者和疑似病人的行动。东北鼠疫时设立专门的鼠疫医院和隔离观察室,成立巡逻搜查队以防有人对疫情隐瞒不报。对因鼠疫死亡者采取统一处理的方式,控制了感染。山西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沿边各口凡属北来行旅,须经医士诊断色脉形象,确无疫症者收入留验所,其有身体不甚康健稍涉疑似者,则送入隔离所”。“于车辆初到时,查明系来自疫地或从疫地经过者,立时由医官消毒,指派警士交由检疫所留验”。<sup>3</sup>两次鼠疫中,军警都参与了其中的管理。阎锡山在山西事实上掌握着军政两权,因此山西在防疫过程中的军事力量介入要更加明显。省军署和警察组成防疫办公处,调动军队在交通要道的关键渡口设置了48处驻军点。东北警务局等也参与了疫情管理,但显然没有山西那样统一行动。

两次鼠疫都很重视对防疫知识、措施、法规的宣传。东北鼠疫时,《盛京时报》刊登了大量的鼠疫相关文章,《大公报》向公众普及“鼠疫是什么”、“鼠疫为什么产生”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公众对未知事物的恐慌,稳定人心。还通过布告,传单,宣讲员专门演说等宣传防疫知识。<sup>4</sup>山西在宣传普及鼠疫知识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阎锡山在1月21日致电全省文武长官,用500余字的电文详细告知肺鼠疫流行机理。各级防疫机构通过组织防疫会、宣讲员进村宣讲和发放传单等方式,向民众普及鼠疫流行及预防知识。

### 三、两次鼠疫影响之比较

首先,两次疫情的控制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结果。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后清政府的防疫能力不足和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给了列强进一步侵蚀中国主权的时机,清政府不得不迅速采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建立起初步的卫生防疫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危局。这就给了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一个良好的空间,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也被保留了下来。到民国时期,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山西鼠疫中,政府已经认识到民众很难通过自身的知识水平去防疫,必须要通过政府的强制管理手段,因此设立了防疫总局,各种专业机构的设置,以军队、警察为督导的防疫举措都是以往所未见的。不难看出,公共卫生被纳入了政府工作范围。

其次,两次疫情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医的发展。东北疫情时,国内西医数量很少,初期,哈尔滨全城找不到一名西医,只从奉天找到两名中国西医和一名日本医生,只能致电清廷中央加派西医专家,后伍连德等专家才来到东北。伍连德在东北建立了医院、实验室、检疫站等卫生机构,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邀请专家来东北与他一同进行研究,还想办法为手下的医官出国深造创造条件,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山西鼠疫时,伍连德所在东三省防疫事物总管理处也参与了防治。此时西医的发展较1910年的东北有了较大的进步。山西政府聘请美国医学博士杨怀德为总顾问,下令“凡西医学士暨留学东西洋医员,无不优礼致之,派往各地担任检查”。此次防疫中共有中外医生及看护员共有67名,这些医护人员被派往各防线所经之县,构成防疫的主要技术力量。山西本地的中医中,不少人对鼠疫有了科学的认识。赵儒珍所撰《临县防疫记》就接受了西医有关鼠疫病因的解释:“其传染情形为由最接近病人者,以渐扩充,受传染后多数淋巴腺肿胀化脓,鉴别诊断知为腺鼠疫,而媒介则则为蚤虱蚊蝇之类。”<sup>2</sup>经过了1918年的严重鼠疫,对山西本土的医学发展特别是西医发展有了较大推动。

最后,疫情结束后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东北鼠疫扑灭后,政府编写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在万国鼠疫研究会后与会的部分人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完成了《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成书于1911年,记录了1910-1911年间东三省鼠疫的爆发及蔓延情况,各地对鼠疫的防疫措施和成效,媒体对疫情的报道等,对鼠疫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汇编。《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是“万国鼠疫研究会”后出版的总结性资料。清政府于1911年4月组织召开了晚清中国第一次国际防疫学术大会“万国鼠疫研究会”。会上伍连德就东北三省鼠疫的经验与参会的11国医学专家进行了交流,各国医学专家介绍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防疫理论、防疫措施。这次交流对中国医学的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阎锡山对《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编写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吾国治疫之说旧有之,防疫之事略而不详,前清宣统二年始行于东三省”。<sup>3</sup>因此,在山西1918年鼠疫后,阎锡山借鉴东北鼠疫后编写报告书的经验,派山西防疫总局编辑处纂修了《山西省疫事报告书》,“今存其实以借后之参考,近世学说日益发明,后有新法能减其困难”。<sup>4</sup>这是一部体例完整,内容详细,有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报告,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大量图片、数据,为后人研究疾病史提供了直接的材料。该书的内容不仅局限于防疫,还涉及到当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中西医的分歧、阎锡山个人的思想和施政措施等,不论对医学史还是对近代山西的政治史、社会史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在1918年山西大范围的鼠疫扑灭后,政府对疫病的关注迅速降低。事实上,当时临县从1918年到1932年,兴县到1939年,几乎年年都有鼠疫,但阎锡山政府并未采取1918年山西鼠疫时的严格防疫政策,很快就对这两县的疫情不再关注。至1929年,防疫工作几乎完全成为县级政府的地方事务。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并未建成。以政治稳定为指导思想而非以人民生命健康为根本的卫生防疫,事实上有着很大的缺陷。回望三年的新冠疫情防治之路,并不比历史上的历次瘟疫防治来的容易。即使在医疗卫生水平已经发达和科技进步的今天,人类对未知的病毒、对传染性很强的疫病仍然无法迅速控制。无论如何,每一次的疫情防控都在事实上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的防疫治理能力,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深刻反思。

### 参考文献:

- [1]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2]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3]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4][日]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M].北京: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19.
  - [5]王承基.山西省疫事报告书[M].山西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
  - [6]焦润明.清末中国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之滥觞[J].晋阳学刊,2019,(1):44-57.
  - [7]宋谦.论1918年山西鼠疫与政府因应[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8):111-116.
- 作者简介:段珂(1989-),女,山西省原平市,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史、科学技术史。
- 项目名词: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2020zsszx078)